

後現代思維與第二波正向心理學在諮商的應用

劉淑慧^{1*}、孫頌賢²、夏允中³、王智弘¹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¹、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³

後現代思維與第二波正向心理學研究正逐漸發展中，諮商與心理治療取向之演進也有著相互輝映的關連，蘊含著對現代思維在哲學上、學理上的多項變革。本學報第 49 期所收錄的五篇實徵性研究論文，恰可展現出這樣的特色，其中，強調人本主義的成長取向並相信人類具有尋求意義與創造意義的驅力、系統理論的視框、後現代思維中更具平等性的助人關係或研究關係等等，呈現出後現代思維與第一波正向心理學的貢獻，強調辯證思維則突顯出第二波正向心理學的突破。溯本究源，辯證思維根本是華人文化之特色與優勢所在，期待華人文化所蘊藏的更多瑰寶，能夠帶出後現代思維與正向心理學之持續革命與突破，新近發展中的修養心理學或許是可期待的瑰寶之一。

關鍵詞：成長取向、系統觀點、後現代思維、第二波正向心理學、辯證思維。

歐洲文藝復興帶來的現代主義（modernism）思潮，引導人們走出封建與宗教傳統的束縛，相信人們可以透過理性批判、數理科學方法獲得知識、選擇價值、追求自由，成為自己的主宰、主導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這股思潮廣泛地帶動了政治、文化、科學、工業、社會的巨大變化（沈清松，2000；Martin & Sugarman, 2000），也造就了崇尚否證主義研究方法（falsificationist research design）的實證主義心理學（positivist psychology），以及奠基於生物醫學模式（biomedical model）、依循科學家—實務工作者訓練模式（scientist/practitioner model）的諮商與臨床心理學（Dueck & Parsons, 2004），也就是上一期主編室的話「期待兩種心理學之中道發展」（劉淑慧、王智弘、孫頌賢、夏允中，2017）之中所謂的第一種心理學，「就像是『生理性的腦』，奉行科學主義，強調自然科學的邏輯性，展現出偏重知識的學術旨趣，以理性所標榜的『合理性』見長，描述客觀事實（p.1）」。

然則，隨之出現的世界大戰和現代化歷程中的人性異化，敲出響鐘，喚起人們對現代思潮的質疑與反思（沈清松，2000），後現代思潮（postmodernism）於焉興起，成為對理性思維、線性發展、科學真理之類單一標準或價值的反動（Martin & Sugarman, 2000）。人

致謝詞：編輯群（本文作者）非常感謝兩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幫助編輯室提出紮實而中肯的論述。

* 通訊作者：劉淑慧，email: gushliu@cc.ncue.edu.tw

DOI：10.3966/172851862017080049001

文與社會科學領域遂出現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的知識論 (Dueck & Parsons, 2004), 以及宣稱主體 (subjectivity) 死亡的 (沈清松, 2000; 姜文斌, 2016)、奠基於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 (i.e., Brummett, 1976; Ermann, 2012; Fabian, 2014) 的本體論。學者們放棄了普遍性 (universality)、累加性 (totalizing), 轉而強調在地化 (localization)、獨特性 (particularity)、差異性 (difference) (Dueck & Parsons, 2004), 以及歷史性 (historicity)、脈絡主義 (contextualisation) (Bekerman & Tatar, 2005), 展現出由主體走向他者 (the other, 包含自我以外的其他人事物以及自然界和超越界) 以及由表徵 (representation) 走向模擬 (simulation) 的文化趨勢 (沈清松, 2000), 開啟了敘事性認同 (narrative identity) (i.e., Ibarra & Barbulescu, 2010; LaPointe, 2010; Stokes, 2012)、關係性自我 (relational self, i.e., Anderson, 2012)、自我宛若他者 (self as others) (孫雲平, 2017) 之類的論述空間。上一期主編室的話 (劉淑慧等人, 2017) 之中所謂的第二種心理學就深受後現代影響, 「就像是『人文性的心』, 奉行踐行主義, 強調社會科學的人文精神, 展現出偏重主體成長的實踐旨趣, 以生活所關注的『合情性』見長, 描述主觀意圖 (p.1)」。

誠如華人辯證哲學的觀點, 「物極必反」以及「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劉淑慧、孫頌賢, 2017; Liu, Hung, Peng, Chang, & Lu, 2016), 後現代思潮作為一種反動, 它的發展本身也招致新的反動。國外有 Martin 和 Sugarman (2000) 倡議建立現代與後現代的「中間位置 (a middle-ground position)」; Casey (2000) 呼籲創造出超越現代與後現代限制的蘇活方案 (a revitalized project); Zhao (2007) 以及 Thanopoulos (2012) 不約而同地主張融入後現代取向的互為主體性才能讓現代取向的主體性導向正向發展。在兩岸四地的華人心理學者社群中, 也有不少人紛紛提出各種超越兩種心理學對立、創造和諧的「致中和」方法 (劉淑慧等人, 2017)。綜此, 現代與後現代之相輔相成、辯證發展實乃未來的突破之道 (劉淑慧等人, 2017; Liu et. al., 2016)。

後現代思潮之流風所及, 對現代取向心理學的各种反動應運而生, 正向心理學 (positive psychology) 可視為對生物醫學病理模式心理學的反動, 涉及哲學觀、心理健康與人類行為研究範疇的演進。在哲學觀方面, Maslow 的人本心理學 (humanistic psychology) 可說是近代正向心理學的濫觴, 它依循人本主義, 提出需求階層論 (hierarchy of needs), 認為人類天生具有追求自我實現與真善美的「內在自然 (inner nature)」驅力, 是一種成長取向 (growth-oriented) 的思維 (Maslow, 1970)。人本心理學的興起, 引發心理健康與人類行為研究範疇的改變, 在 Seligman 於 1998 年的鼓吹與整合下, 正向心理學的稱號正式誕生 (Seligman, 2002)。不同於傳統心理學對於負向心理狀態的重視, 正向心理學的研究更強調對正向心理特質的探究, 像是愛、樂觀、勇氣、復原力 (resilience)、心流 (flow)

等 (Snyder & Lopez, 2007)。正向心理學實踐了人本主義的哲學觀，強調瞭解心理健康的內涵，不僅需要瞭解什麼元素造成「失敗」，更應該瞭解什麼元素引發「成功」；不僅需要知道什麼元素能預測「疾病」，更應該瞭解什麼元素可以導致「幸福 (wellbeing)」。

作為反動的正向心理學，正在蓬勃發展中，不但已經有不少專書出版，也有了專屬期刊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正向心理學期刊) (Coetsee & Viviers, 2007; Seligman, Steen, Park, & Peterson, 2005)。然則，正向心理學本身也引發了新的反動，因而呈現出與生物醫學病理模式相輔相成、辯證發展的趨勢。例如，Lomas 與 Ivztan (2016) 就批評第一波正向心理學忽略了過去負向心理特質研究的貢獻，因而倡議發展第二波正向心理學 (Second Wave Positive Psychology, SWPP)。畢竟，光是關注正向心理特質，會有其侷限性，容易走向過度樂觀、過度正向的矛盾與偏頗，因為正向心理特質往往同時兼具正向與負向功能，而且，正向與負向心理特質之間具有辯證性 (dialectics)，負向心理特質可能存在著正向的意義與價值，正向心理特質也可能引發負向的行為結果 (Lazarus, 2003; Lomas & Ivztan, 2016)。採用第二波觀點才能更貼切地探究正負向心理特質的複雜、動態、非線性、辯證發展歷程 (Lomas & Ivztan, 2016)。Torre (2007) 也認為，過於強調正向態度，無異於暗示這些態度比較具有優勢和生產力，製造出人為的二分切割與評價，破壞了人的整體性，忽略了人類整體運作與動力的複雜性。McDonald 和 O' Callaghan (2008) 甚至從傳科觀點提出批判，認為正向心理學偏頗地突顯出某些品格或美德，其實相當於變相地支持特定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之勢力，在本質上是一種價值壓迫。徐欣萍 (2017) 則從本土化的角度闡明，西方的正向心理學缺乏華人文化視域，盲目推展可能帶來陷阱與困境，並主張適用於華人文化的正向心理學應該添入修養、關係及行動的要素。這些反思性觀點正可支持華人文化中的辯證思維 (dialectical thinking) 特性 (徐欣萍, 2017)，如同太極一般，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又如《老子》所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展現在華人的待人處世上，就是注重動態過程以及同步關切與兼顧事物正反多元面向的傾向。Wong (2017) 除了支持第二波正向心理學的歷程性與辯證性觀點，更主張以人本主義為基礎，以意義中心取向 (Meaning-Centered Approach) 為方針，因為所有心理特質的研究都可以找到個體追尋意義 (meaning-making) 與創造意義 (meaning-seeking) 的心理驅力。

無獨有偶地，諮商與心理治療學派的演進也呈現出從現代取向到後現代取向再到現代與後現代相輔相成、辯證發展的趨勢，其中，從關注病理到關注正向特質再到關注正負特質的辯證發展，正巧和正向心理學的第一二波發展相互應和。正向心理學與後現代諮商取向的發展，一個屬於學理基礎的範疇，另一個則屬於應用實踐的範疇，但兩者像是異卵雙胞胎，留著同樣的後現代血脈，各自呈現出自己的精采。

後現代取向諮商的特徵包括：不再仰賴絕對的真理（true）與客觀，強調對事件的多元意義解讀，認為個體具有獨特存在的行動能力，並且能透過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的互動過程中重新建構所謂的真實（reality）（Rigazio-DiGilio, 2011）。後現代取向諮商也轉化了「諮商關係」的維繫方式，後現代取向諮商工作者相信人只能為自己建構真實；諮商關係不再是強調當事人是病人的醫病關係，也不是權威與未知者的階級關係，而更朝向合作與更具「平等性」的同盟關係，諮商師是促發改變的專家，但當事人才是經營自己朝向幸福人生的專家（蕭文，2004）。

後現代取向諮商與正向心理學相輝映之處，就在於將諮商的本質從修復問題轉為積極支持個人發展。傳統諮商心理學關注的是發展與調適的問題，正向心理學不僅讓諮商工作者獲得更豐富而精確的語彙與知識，得以深入理解與描述求助者的優勢（strength），更進一步延展與重塑諮商工作者對問題的概念化與評量方式（Ivey & Ivey, 1998），幫助他們發掘求助者的優勢與資源（Flückiger & Grosse Holtforth, 2008），建立學習者的品格優勢（character strengths）和美德（virtues）（Park & Peterson, 2008），從如何（how）與什麼（what）的角度，協助一個人成功與適應良好（蕭文，2004；Harris, Thoresen, & Lopez, 2007）。Welfare、Farmer 與 Lile（2013）的研究也顯示，諮商師能以優勢觀點進行個案概念化時，諮商效果可能會比關注當事人的負性特質來得有效。可見，正向心理學研究的內涵，可以做為諮商與心理治療學派的發展的基礎；而諮商實務歷程，也可以作為正向心理學研究的體現。

拜後現代思維與正向心理學之賜，不少關注正向特質的諮商學派應運而生，最早出現當屬強調協助當事人發展成「充分發揮功能的人（fully Functioning person）」的個人中心學派，這個學派秉持了人本心理學的觀點，強調治療關係中正向積極的同理與接觸，是擺脫生物醫療病理模式的重要里程碑，實徵研究也顯示，具備充分功能的人可以獲得較高的生活滿意度（Proctor, Tweed, & Morris, 2016）。隨之發展的現實治療學派，更將治療焦點轉移到當事人「做了什麼可以成功」，而不再是「為什麼造成不適應」（Corey, 2016）。最直接彰顯正向特質的則是各式各樣的正向心理治療（positive psychotherapy）（i.e., Andrewes, Walker, & O' Neill, 2014; Englar-Carlson & Kiselica, 2013; Proyer, Gander, Wellenzohn, & Ruch, 2014; Shoshani & Steinmetz, 2013; Sin & Lyubomirsky, 2009; Tan, 2006; Walsh, Cassidy, & Priebe, 2017）、優勢取向（strength-based）諮商（Littman-Ovadia, Lazar-Butbul, & Benjamin, 2013; McCammon, 2012; Park & Peterson, 2008; Welfare et. al., 2013）和優勢中心（strength-centered）諮商（王玉珍，2013；Wang & Lee, 2017; Wong, 2006a, 2006b），以及關注社會興趣（social interest）和勇氣（encouragement）的 Adler 取向諮商（Hamm,

Carlson, & Erguner-Tekinalp, 2016; Paige, DeVore, Chang, & Whisenhunt, 2017)。敘事治療 (narrative therapy) 與焦點解決短期治療 (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SFBT) 則進一步發展出細緻的諮商策略來幫助當事人重新看見自己的優勢與力量。

其中，敘事治療與 SFBT 深受社會建構論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的影響，強調各類失功能的行為問題其實是被社會互動的語言建構出來的，沒有絕對的對錯是非 (Corey, 2016)。SFBT 秉持著正向的人性觀，透過例外式問句，重新協助當事人看到行為問題以外的可能性，SFBT 並強調行動導向與正向改變；敘事治療則試圖將問題外化，當「問題不再是問題」時，當事人會在諮商晤談的解構與建構中，重新尋找自身處境的新意義，以及與所謂「問題」共處之道。如同 Janoff-Bulman (1992) 所強調，人類的共通基本信念包括：這個世界有慈悲與意義的存在、自我是有價值的、人們具有追尋與創得意義的行為傾向，外化並解構問題，幫助人們找到更具建設性的方式來建構個人世界。雖然 SFBT 的發展並非完全以正向心理學為基礎，但仍看到其內涵與正向心理學的相互呼應，都強調對正向心理特質的「關注」與「促發」。

此外，家族治療取向的發展也與後現代思維與正向心理學的內涵有著相呼應的關連，在某個層次上，可說是正向心理學的具體實踐。它以系統理論 (system theory) 作為科學典範，認為所謂「心理疾病」或「行為問題」，其實是伴侶與家庭系統的問題解決方式，改變系統互動模式以尋求新的問題解決方式，變成主要的介入焦點 (Nichols & Davis, 2016)。透過系統理論的視框，助人工作者有機會在諮商晤談中，重新看見當事人「失功能」行為背後的不同意義，像是 Satir 學派著重成長模式，重新看見個體在失功能系統互動中對愛的渴望 (Satir, 1983)，情緒取向伴侶治療 (Emotionally Focused Couple Therapy)，則協助伴侶在系統互動中，擴展對不同深層情緒經驗的正向與負向功能的覺察 (Johnson, 2004)。

儘管這些後現代取向的、呼應正向心理學的諮商理論確實為諮商專業發展注入新的生命力，但也引發不少批判、反思的聲音，因而促成各種「致中和」的新理論或模式或路線。例如，Lambert 和 Erekson (2008) 質疑人本取向諮商過於關注正向情緒，殊不知在當事人表達負向情緒時給予讚許反而更能導引出正向情緒；Ingram 和 Snyder (2006) 則提出整合正向心理學和認知治療的模式，企圖讓所謂「以好為焦點」和所謂「以壞為焦點」相輔相成，而且，Curwood、DeGeer、Hymmen 和 Lehmann (2010) 已經將此種結合實際應用在家暴配偶的男性，因而幫助他們改變自己看待與處理內外在生活世界與家人關係的方式。

上述回顧顯示，後現代思維與正向心理學的特色之所在，並不僅只是將研究焦點關注

在人類行為的「正向特質」，更蘊含著哲學上、學理上的多項徹底變革，更包括：強調人本主義的成長取向以及相信人類具有尋求意義與創造意義的驅力、系統理論的視框、後現代思維中更具平等性的助人關係或研究關係、華人文化中的辯證思維等。而本學報 49 期所收錄的五篇實徵性研究論文，包括三篇與正向特質直接相關的研究成果，以及一篇強調平等關係的團體諮商同盟研究、一篇強調發掘問題以外可能性的 SFBT 督導研究。下文將從後現代思維與正向心理學的哲理與學理內涵，來詮釋這五篇研究，並透過這五篇研究的成果，來論述正向心理學的特色，以及朝向第二波發展的重要性。

第一，成長取向與簡單心理學：正向心理學秉持人本心理學的精神，相信個體具有朝向成長與正向發展的傾向，與傳統強調缺陷取向（deficit oriented）有所不同（Berman & Davis-Berman, 2005）。正向心理學的成長取向，也同時是一種簡單心理學（simple psychology），認為心理學研究應以瞭解對一個人什麼是有用的、什麼是重要的為方針，而非僅是探究複雜的心理結構（Linley, Joseph, Harrington, & Wood, 2006）。而本期張總懿、劉奕蘭所撰寫的〈成長主題、意義化與台灣成人心理成熟的關聯性初探〉一文，特別突顯出正向心理學中的成長取向觀點。該研究主要探討在台灣社會文化中，何謂社會認知成熟及社會情緒幸福感等「心理成熟」的樣態，除了發現受訪者的學業挫折或工作表現不佳可以預測較低的社會幸福感，更發現能在高峰經驗中描述成就主題並能賦予事件意義化者，具有較高的社會認知成熟度。這些結果呼應了正向心理學的想法，認為朝向高峰經驗的心理傾向以及意義化，是協助個體朝向心理成熟的重要驅力，也同時突顯出台灣文化對於學業或工作成就的重視，並且變成台灣人如何定義人生幸福的一部份。

而許維素、游于萱所撰寫的〈輔導教師之焦點解決督導員訓練成效研究〉，除了同質異形地將 SFBT 應用於督導員訓練模式中，也呼應了正向心理學的成長取向與簡單心理學觀點。SFBT 督導模式，不僅強調找出受督者的正向資源與優勢，也相信改變會發生、問題不會一直存在，協助受督者找出有用、可改變的部分成為該督導模式的重點。該研究結果的確發現，這些接受督導員訓練的輔導教師自陳獲得多元的成效，不僅提升了督導專業能力，也在學校輔導工作場域中提升了輔導行政效率以及降低了工作倦怠感，甚至帶動了個人的人際與生活的轉變。如此成效顯示，SFBT 督導訓練模式可能帶來的不只是專業能力的提升，也是個人人生哲學觀的改變。這正彰顯出正向心理學所蘊藏的人本主義哲學觀之精神，這種哲學觀的實踐能夠深入影響整體人生，讓人將正向積極與目標導向的態度廣泛應用在工作、人際、生活等多元生活層面的議題。

而謝麗紅、巫珮如所撰寫的〈團體領導者工作同盟量表編製與相關研究〉，檢證了 Bordin 對諮商歷程中工作同盟（working alliance）的看法，強調在治療關係中著重於可以

促成改變的正向元素與有用因素，而不再強調治療關係僅是當事人病態的投射，也呼應了正向心理學中的成長取向與簡單心理學之精神。

第二，系統觀點：正向心理學運用了系統觀點的視框，以描述多元的、複雜的、非線性的關係，從而重新發現個體行為的正向意義與內涵。系統觀點的主張，個體所發生的心理議題或臨床症狀，其實是反應了個體處於失功能的系統運作模式，個體行為與系統運作之間是交互作用的，而非傳統認為單向的因果關係（Pinsof, 1992）。Lomas、Hefferon、與Ivtzan（2015）的論述也認為，正向心理學的研究應能涵括大腦、心智、社會、文化等多元層面，並藉由系統觀點，發掘不同心理特質的正向意義與特性。誠如本期黎佩欣、朱玲慧、余民寧的〈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人際關係是影響樂觀解釋風格與幸福感間關係的中介角色〉所發現的，國小六年級新移民學童，在遇到困難或挫折時，樂觀的解釋風格雖能預測幸福感，但必須透過個體與各種人際關係有著良好的相處經驗（中介效果），才能產生良好預測力；個體必須在人際關係的系統脈絡中，實踐樂觀解釋風格的心理傾向，個體才會感覺到主觀上的幸福感。該研究呼應了正向心理學具有系統觀點的視框，幸福感是一種發生在人際互動脈絡中的經驗，而且相關預測變項之間具有非線性關係。

而〈團體領導者工作同盟量表編製與相關研究〉所編制的團體工作同盟量表，其實是謝麗紅、林詠昌（2014）研究成果的延伸，在本次研究中以發展團體領導者自評團體工作同盟的量表為主，在2014年的研究中，該量表用於團體成員自評團體工作同盟的程度與內涵。這兩次研究最精彩之處，是嘗試實踐了系統觀點，將團體中不同次系統的關係都納入測量，包括團體領導者與焦點成員、焦點成員與其他成員、團體領導者與其他成員、以及團體領導者與整體團體等。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研究結果也發現團體領導者在自評團體工作同盟的程度，與成員自評該團體氣氛（投入、逃避、衝突等）之相關雖有顯著，但卻不高，這似乎顯示出團體領導者與成員之間對團體氣氛的知覺有著不同的評價，也呼應正向心理學秉持系統觀點來瞭解不同的心理現象時，可能會看到不同的心理意涵。

第三，後現代思維中的平等性：Wong（2017）認為，第二波正向心理學的研究範疇，更重視研究參與者的價值與主觀經驗，以及更重視從研究參與者的主觀經驗，來瞭解什麼是成功經驗、正向特質、或幸福感。這似乎顯示正向心理學背後隱含著對社會建構論的信仰，研究者或助人工作者不再是全知的權威或專家，而能更謙卑的與研究參與者／受試者／當事人維持具「平等性」的關係，而研究者或助人工作者站在協助研究參與者／受試者／當事人述說其主觀經驗的位置上，以擴展我們對正向心理特質的重新理解。本期〈成長主題、意義化與台灣成人心理成熟的關聯性初探〉、〈輔導教師之焦點解決督導員訓練成效研究〉、以及〈團體領導者工作同盟量表編製與相關研究〉等研究論文，都在研究方法

上、或是治療觀點上，實踐了此平等性的精神。台灣成人心理成熟的研究報告在研究方法上做出突破，一方面採用造句測驗、撰寫成長主題故事等更能突顯出主觀建構的工具，提升了研究參與者的地位與價值，更能看到台灣成人的「心理成熟」經驗與意義建構，另一方面透過標準化的步驟將敘說資料加以量化，進行嚴謹的統計分析；SFBT 督導員訓練研究，採用焦點解決取向研發培訓輔導教師作為督導員的理論架構，展現出對督導員的正向信賴，相信受訓的督導員會發展出自己在督導實務上的應用方式，此研究結果似乎也呼應了正向心理學的平等性精神。該研究也採用 Kirkpatrick 四層次教育訓練成效評估模式作為研究方法，系統性地關注職輔導教師參與受訓的多向度主觀感受。工作同盟的研究認為工作同盟的意義在於諮商師與當事人之間維持著正向的合作關係，諮商師是協助當事人改變的經理人（agent），而非全能的指導者（Horvath, 2000），並將合作關係聚焦於協助當事人達成治療「目標」、治療「任務」、以及在治療關係中形成自然親密的「連結」。亦即，團體領導者與當事人之具有平等性的助人關係，相信團體領導者是促成團體運作的專家，但參與成員是協助自己運用團體力量來改變的專家。

第四，辯證思維：如同前文所述，辯證思維是對後現代思維的重要反動之一，也是第二波正向心理學對第一波正向心理學的關鍵修正，本期周芸安、陳坤虎所撰寫的〈系統性樂悲觀之建構及其在身心適應之功能〉之研究論文，即指出第一波正向心理學研究的矛盾之處，其所發展的「系統性樂悲觀」之概念與量表，將樂悲觀的心理特質分成「功能性樂觀」、「失能性樂觀」、「功能性悲觀」和「失能性悲觀」等四種型態，並發現樂觀也會有失功能性：失能性樂觀可能因過度理想化，而能預測拖延習慣；悲觀也可能具有功能性：悲觀可能是個體呈現過度防範失敗的結果，而能預測焦慮與憂鬱傾向的發生。該研究呼應了第二波正向心理學發展的重要性，也突顯出第二波所標榜的辯證思維。

透過本期的五篇研究論文，看到了不同於現代取向生物醫學病理模式的正向觀點，包括成長取向、系統觀點、關係中平等性等，呈現出後現代取向與第一波正向心理學長期以來對諮商專業的貢獻，〈系統性樂悲觀之建構及其在身心適應之功能〉一文所凸顯的辯證思維，則突顯出第二波正向心理學的突破。期望藉由這五篇研究論文的彙集，對國內現代思維與正向心理學的研究與應用，提供更多、更深入的啟發與共鳴。

綜合以上文獻回顧以及當期文章剖析，可發現華人文化或許可作為未來充盈後現代思維與第二波正向心理學的重要資產。溯本究源，辯證思考不但是西方第二波正向心理學的核心精神，以及西方對後現代思維的重要修正之一，更是華人文化長久以來的特色與優勢之所在。更何況，Wong（2017）主張，進行第二波正向心理學研究時，要考慮到個體會依循不同的文化脈絡而採取多元方式來尋求意義與創造意義，換言之，第二波的未來發展

勢必要將多元文化的特性納入思考範疇。徐欣萍（2017）也呼應，正向心理學的後續發展與推動需要考量文化脈絡，並進行本土化的修正。可見，深入華人文化去了解辯證思維的奧秘，以及其在目前華人生活世界的活生生運作，不但有助於現代思維與第二波正向心理學在華人文化中的應用，甚至可因此充盈西方的後現代思維與第二波正向心理學之發展。

事實上，華人文化還蘊藏更多有助輔導與諮商的瑰寶，例如，最近有若干台灣學者分別在國外期刊《Frontiers in Psychology》(Hwang, Shiah & Yit, 2017) 與國內期刊《本土心理學研究》(黃光國、夏允中、越建東, 2016) 提出以儒釋道文化內涵為主的心理學，稱之為修養心理學 (psychology of self-cultivation)，徐欣萍（2017）也主張華人文化可為正向心理學添加修養的要素。本學報則呼應本土化與深耕的需要，正在徵求「本土諮商心理學」、「現象學之本土深解與踐行」、「家庭心理學在輔導、諮商與心理治療上的應用」、「兒童心理諮商與家長諮詢」的文稿，期待華人文化以及華人生活世界的生活智慧 (lived wisdom)，可以為輔導與諮商專業帶出持續的革命與突破。

參考文獻

- 王玉珍 (2013)：優勢中心取向生涯諮商歷程與改變經驗之敘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7，125-155。[Wang, Y.-C. (2013). The therapeutic effectiveness and the change process of a strength-centered career counseling model.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37, 125-155.]
- 沈清松 (2000)：在批判、質疑與否定之後－後現代的正面價值與視野。《哲學與文化》，27(8)，705-716。[Shen, V. (2000). After critic, question, and denial: Positive value and framework of postmodernism.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27(8), 705-716.]
- 姜文斌 (2016)：論傅柯「人之死」的概念兼談主體解放與生命的意義。《生命教育研究》，8(1)，1-22。DOI: 10.3966/207466012016060801001 [Chiang, W-P. (2016). A study on Foucault's "death of man": The liberation of subject and meaning of life. *Journal of Life Education*, 8(1), 1-22. doi: 10.3966/207466012016060801001]
- 孫雲平 (2017)：在宗教與神學裡的人－呂格爾的人觀。《哲學與文化》，44(7)，25-43。[Sun, Y-P. (2017). Man in religion and theology: Ricoeur's conception of man.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44(7), 25-43.]
- 徐欣萍 (2017)：心理健康促進與正向心理學的本土化反思。《應用心理研究》，66，7-46。DOI: 10.3966/156092512017060066002 [Hsu, H-P. (2017). Cultural reflections on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66, 7-46. doi:

10.3966/156092512017060066002]

- 黃光國、夏允中、越建東 (2016)：從本土心理學到修養心理學。 *本土心理學研究*，47，3-23。
[Hwang, K. K., Shiah, Y.-J., & Yit, K.-T. (2016). From indigenous psychology to self-cultivation psychology.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47, 3-23.]
- 劉淑慧、王智弘、孫頌賢、夏允中 (2017)：主編室的話：期待兩種心理學之中道發展。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48，1-3。 [Liu, S.-H., Wang, C.-H., Sun, S.-H., & Shiah, Y.-J. (2017). Editor's note: Call for harmony between two counseling psychologies.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48, 1-3.]
- 劉淑慧、孫頌賢 (2017)：細描關係中的辯證發展。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47，1-2。 [Liu, S.-H., & Sun, S.-H. (2017). Describing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in relationship.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47, 1-2.]
- 蕭文 (2004)：個案為什麼沒有按照劇本演出—後現代思考與諮商典範的轉移。 *輔導季刊*，40 (3)，1-5。 [Hsiao, W. (2004). Why the case did not follow the script: Postmodern thinking and the transfer of counseling paradigms. *Guidance Quarterly*, 40(3), 1-5.]
- 謝麗紅、林詠昌 (2014)：團體諮商工作同盟量表編製研究。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40，59-93。 [Hsieh, L.-H., & Lin, Y.-C. (2014). Development of group counseling working alliance scale.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40, 59-93.]
- Anderson, H. (2012).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 and dialogic conversations ideas for a relationally responsive practice. *Family Process*, 51(1), 8-24. doi:10.1111/j.1545-5300.2012.01385.x
- Andrewes, H. E., Walker, V., & O'Neill, B. (2014). Exploring the us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s in brain injury survivors with challenging behaviour. *Brain Injury*, 28(7), 965-971. doi: 10.3109/02699052.2014.888764
- Bekerman, Z., & Tatar, M. (2005). Overcoming modern-postmodern dichotomies: Some possible benefits for the counselling profession.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 33(3), 411-421. doi: 10.1080/03069880500179723
- Berman, D., & Davis-Berman, J. (2005).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outdoor education. *Journal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 28(4), 17-24.
- Brummett, B. (1976). Some implications of process or intersubjectivity: Postmodern rhetoric. *Philosophy & Rhetoric*. 9(1), 21-51.
- Casey, C. (2000). Work, non-work and resacralizing self. *Social Compass*, 47(4), 571-587.
- Coetzee, S., & Viviers, R. (2007).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positive psychology in South Africa.

-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7(3), 470-490. 2016.9.25 from: <http://uir.unisa.ac.za/bitstream/handle/10500/18250/An%20overview%20of%20research%20on%20positive%20Psychology%20in%20South%20Africa.1.pdf?sequence=4&isAllowed=y>
- Corey, G. (2016).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10th). Belmon, CA: Brooks/Cole.
- Curwood, S. E., DeGeer, I., Hymmen, P., & Lehmann, P. (2010). Using strength-based approaches to explore pretreatment change in men who abuse their partner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6*(13), 2698-2715. doi: 10.1177/0886260510388283
- Dueck, A., & Parsons, T. D. (2004). Integration discourse: Modern and postmoder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32*(3), 232-247.
- Englar-Carlson, M., & Kiselica, M. S. (2013). Affirming the strengths in men: A positive masculinity approach to assisting male client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91*(4), 399-409. doi: 10.1002/j.1556-6676.2013.00111.x
- Ermann, M. (2012). The intersubjective perspective and the change of psychoanalytic identity. *International Forum of Psychoanalysis, 21*, 150-153. doi: 10.1080/0803706x.2012.663935
- Fabian, J. (2014). Ethnography and intersubjectivity: Loose end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4*(1), 199. doi: 10.14318/hau4.1.008
- Flückiger, C., & Grosse Holtforth, M. (2008). Focusing the therapist's attention on the patient's strengths: A preliminary study to foster a mechanism of change in outpatient psychotherapy.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4*(7), 876-890. doi: 10.1002/jclp.20493
- Hamm, J. S., Carlson, J., & Erguner-Tekinalp, B. (2016). Adlerian-based positive group counseling interventions with emotionally troubled youth. *The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72*(4), 254-272.
- Harris, A. H. S., Thoresen, C. E., & Lopez, S. J. (2007). Integrating positive psychology into counseling: Why and (when appropriate) how.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85*, 3-13.
- Horvath, A. O. (2000).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From transference to allianc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6*(2), 163-173.
- Hwang, K. K., Shiah, Y.-J., & Yit, K.-T. (2017). Eastern philosophies and psychology: Towards psychology of self-cultiv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083. doi: 10.3389/fpsyg.2017.01083
- Ibarra, H., & Barbulescu, R. (2010). Identity as narrative: Prevalence, effectiveness, and consequences of narrative identity work in macro work role transi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5*(1),

- Ingram, R. E., & Snyder, C. R. (2006). Blending the good with the bad: Integrating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0(2), 117-122.
- Ivey, A. E., & Ivey, M. B. (1998). Reframing DSM-IV: Positive strategies from developmental counseling and therapy.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76, 334-350.
- Janoff-Bulman, R. (1992). *Shattered assumptions: 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traum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Johnson, S. M. (2004). *The practice of emotionally focused couple therapy: Creating connection*. (2ed.). New York: Brunner-Routledge.
- Lambert, M. J., & Erekson, D. M. (2008).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Integration*, 18(2), 222-232. doi: 10.1037/1053-0479.18.2.222
- LaPointe, K. (2010). Narrating career, positioning identity: Career identity as a narrative practice.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77(1), 1-9. doi: 10.1016/j.jvb.2010.04.003
- Lazarus, R. S. (2003). Does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movement have legs? *Psychological Inquiry*, 14(2), 93-109.
- Linley, P. A., Joseph, S., Harrington, S., & Wood, A. M. (2006). Positive psychology: Past, present, and (possible) future.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 3-16. doi: 10.1080/17439760500372796
- Littman-Ovadia, H., Lazar-Butbul, V., & Benjamin, B. A. (2013). Strengths-based career counseling.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22(3), 403-419. doi: 10.1177/1069072713498483
- Liu, S., Hung, J., Peng, H., Chang, C., & Lu, Y. (2016). Virtue existential career model: A dialectic and integrative approach echoing eastern philosoph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1761. doi: 10.3389/fpsyg.2016.01761
- Lomas, T., & Ivtzan, I. (2016). Second wave positive psychology: Exploring the positive-negative dialectics of wellbei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7(4), 1753-1768. doi: 10.1007/s10902-015-9668-y
- Lomas, T., Hefferon, K., & Ivtzan, I. (2015). The LIFE model: A meta-theoretical conceptual map for applied positive psycholog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6(5), 1347-1364.
- Martin, J., & Sugarman, J. (2000).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The possibility of self and progressive understanding i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4), 397-406.
- Maslow, A. H. (1970).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 McCammon, S. L. (2012). Systems of care as asset-building communities: Implementing strengths-based planning and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9*(3-4), 556-565. doi: 10.1007/s10464-012-9514-x
- McDonald, M., & O'Callaghan, J. (2008). Positive psychology: A Foucauldian critique.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36*(2), 127-142. doi: 10.1080/08873260802111119
- Nichols, M. P., & Davis, S. D. (2016). *Family therapy: Concepts and methods*. (11th.). Boston: Pearson.
- Paige, M., DeVore, J., Chang, C. Y., & Whisenhunt, J. (2017). The trauma-competent clinician: A qualitative model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 supporting adlerian-based trauma psychotherapy. *The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73*(1), 8-37. doi: 10.1353/jip.2017.0002
- Park, N., & Peterson, C. (2008).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character strengths: application to strengths-based school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12*(2), 85-92.
- Pinsof, W. M. (1992). Toward a scientific paradigm for family psychology: The integrative process system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5*(3/4), 432-447.
- Proctor, C., Tweed, R., & Morris, D. (2016). The Rogerian fully functioning person: A positive psycholog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56*(5), 503-529. doi:10.1177/0022167815605936
- Proyer, R. T., Gander, F., Wellenzohn, S., & Ruch, W. (2014).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s in people aged 50-79 years: Long-term effects of placebo-controlled online interventions on well-being and depression. *Aging & Mental Health, 18*(8), 997-1005. doi: 10.1080/13607863.2014.899978
- Rigazio-DiGilio, S. A. (2011). Postmodern theories of counseling. In D. C. Locke, J. E. Myers, E. L. Herr (Eds.), *The handbook of counseling* (pp.197-218). London: SAGE.
- Satir, V. (1983). *Conjoint family therapy*. Palo Alto, Calif.: Science and Behavior Books.
- Seligman, M. E. P. (2002). *Authentic happines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eligman, M. E. P., Steen, T. A., Park, N., & Peterson, C. (2005). Positive psychology progress: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interven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0*(5), 410-421. doi: 10.1037/0003-066x.60.5.410
- Shoshani, A., & Steinmetz, S. (2013). Positive psychology at school: A school-based intervention to promote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5*(6), 1289-1311. doi: 10.1007/s10902-013-9476-1
- Sin, N. L., & Lyubomirsky, S. (2009). Enhancing well-being and alleviating depressive symptoms with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s: A practice-friendly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linical*

- Psychology*, 65(5), 467-487. doi: 10.1002/jclp.20593
- Snyder, C. R., & Lopez, S. J. (2007).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of human strength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tokes, P. (2012). Is narrative identity four-dimensionalist?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 E86-E106. doi: 10.1111/j.1468-0378.2011.00485.x
- Tan, S. (2006). Applied positive psychology: Putting positive psychology into practice.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Christianity*, 25(1), 68-73.
- Thanopoulos, S. (2012). The mutually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responsible subject. doi: 10.1080/0803706x.2012.658438
- Torre, M. A. L. (2007). Positive psychology: Is there too much of a push. *Perspectives in Psychiatric Care*, 43(3), 151-153.
- Walsh, S., Cassidy, M., & Priebe, S. (2017). The application of positive psychotherapy in mental health care: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73(6), 638-651. doi: 10.1002/jclp.22368
- Wang, Y.-C., & Lee, Y.-M. (2017). The effectiveness of two positive career counseling modules for working pare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Employment Counseling*, 54(1), 23-37. doi: 10.1002/joec.12048
- Welfare, L. E., Farmer, L. B., & Lile, J. J. (2013).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mportance of conceptualizing client strengths. *Journal of Humanistic Counseling*, 52, 146-163. doi: 10.1002/J.2161-1939.2013.00039.x
- Wong, P. T. P. (2017). Meaning-centered approach to research and therapy, second wave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dx.doi.org/10.1037/hum0000062>
- Wong, Y. J. (2006a). Strength-centered therapy: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virtues-based psychotherapy. *Psychotherapy*, 43, 133-146. doi: 10.1037/0033-3204.43.2.133
- Wong, Y. J. (2006b). The future of positive therapy.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43(2), 151-153. doi: 10.1037/0033-3204.43.2.151
- Zhao, G. (2007).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ubject: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Educational Theory* 57, 75-88. doi: 10.1111/j.1741-5446.2006.00245.x

Application of Postmodernism and the Second Wa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Counseling

Shu-Hui Liu¹ Sung-Hsien Sun² Yung-Jong Shiah³ Chih-Hung Wang¹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¹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²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³

Postmodernism and the second wa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re gradually develop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counseling and therapeutic approach has a mutually consensual relationshi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a reaction to modernism, not only focus on the study of positive behavioral traits, but also contain a number of philosophy and academic paradigm changes. This collection of five practical research papers in this journal of 49th issue, just reflects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 emphasis on the growth-oriented of humanism and its belief that human being has the drives of meaning-making and meaning-seeking, the framing of systematic theory, and the more equal helping relationship or research relationship in post-modern thinking indicate the contribution from postmodernism and the first wa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in Chinese culture reveal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second wa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Furthermore, dialectical thinking is the advantage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future study, more treasures of Chinese culture may bring about a continuous revolution and breakthrough in postmodernism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such as the newly developed self-cultivation psychology.

Keywords: Dialectical thinking, growth-oriented, postmodernism, systematic theory, the second wa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 Corresponding author: Shu-Hui Liu, email: gushliu@cc.ncue.edu.tw